

A Court on Horseback

[美] 张勉治

著

董建中

译

(Michael G. Chang)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特别版 刘东◎主编

# 马 背 上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

1680 — 1785

# 的 朝 廷



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张勉治 著

董建中 译

(Michael G. Chang)

# 马 背 上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

1680 — 1785

# 的



# 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美)张勉治著;董建中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10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 - 1785  
ISBN 978 - 7 - 214 - 23340 - 0

I. ①马… II. ①张… ②董… III. ①中国历史—研  
究—1680—1785—英文 IV. ①K249.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1408 号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 - 1785*, by Michael G. Chang,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2007. Copyright © 201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0-2014-056 号

书 名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著 者 [美]张勉治

译 者 董建中

责任编辑 卞清波

特约编辑 康海源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7.5 插页 5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23340 - 0

定 价 90.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 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谨将此书献给我深爱着的  
母亲钟辰珠  
父亲张梁圻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看起来似乎很光鲜,但我自己知道从最初的想法到最后的完成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一路走来,我感谢每一位给予我支持与帮助的人。

1990年代,我很幸运认识到了怎样才能成为专业历史学家,当时我在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身边有着一大群这样的人。差不多十五年来,周锡瑞(Joe Esherick)一直教育我真诚做人。其间,他教导我应该追求的是:论点令人信服、条理清楚,叙述精心构制,论证严密,材料翔实。我只希望这本书能接近他的学术高标准。像所有好的导师一样,毕克伟(Paul Pickowicz)总是给予我更多的指导。有次在一个重要的场合,他平静地说,“事情最后的结果并不总是我们所想的那样”,这话让我不再担心失败,也开启了我学术上的一些大胆想法;毕克伟一直鼎力支持我,是智慧建议的来源,使我不仅学会生存,而且茁壮成长。高彦颐(Dorothy Ko)带领我经历了文化与语言的转变,永久改变了我的思考方式。那是令人陶醉的日子,我进入了思想的殿堂,她对我的学术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她任职的学校一直在变,可是每当我需要时,她总提供灵感,并且向我展示了,解释过去也是一种体验当下、展望更为开放的未来的方式。在圣迭哥拉荷亚镇,我总是盼望着上藤谷藤

隆的课；我一直视他为学识渊博、慷慨大度、幽默与敬业的楷模。柯素芝 (Suzanne Cahill)、王岗培养我立志成为汉学家和书籍爱好者，我一直心存感激。我也从同学那里学到了太多的东西，他们是 Julie Broadwin, James Cook, 董玥, Mark Eykholt, Susan Fernsebner, Joshua Goldstein, 刘璐, Cecily McCaffery, Andrew Morris, Charls Musgrove, Elena Songster, 汪利平。本书中的许多想法和观点都是出自我们共有的经历以及讨论课内外常常是很激烈的讨论。

我会永远记着与贝杜维 (David Bello)、Jeanette Barbieri 在北京与南加州时一起的日子，尤其感谢贝杜维，当我还在“数羊”，也就是埋头清点备办乾隆南巡的各种人财物的时候，他提醒我注意家产制 (patrimonialism)，也感谢他在档案馆、骑车途中、书店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对面艾德熊快餐店的陪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些回忆。也要感谢我的启蒙老师，他们为我开启了思想与制度的大门，送我走上自己所走的道路：F. Jane Scott, Naoni Duprat, John Waters, Perry Link, 周质平, 袁乃瑛, 唐海涛, Marvin Bressler。感谢陆西华 (Gertraude Roth-Li) 十多年前在伯克利精彩的夏季课程，这是我第一次隐隐窥识学术的堂奥。也要特别提到欧立德 (Mark Elliott)，让我分享他的幽默，从而在“权威”面前不感到拘束；他对我的研究有兴趣并给予了积极支持。

国际大学项目的老师使得我在台北收获丰厚；周长贞、吴咸义所做的安排，使我在台北的生活有声有色，帮我度过了一段极艰难的日子。也是在台湾，庄吉发、陈捷先慷慨同意我加入他们的课堂，分享他们的知识与见解。在北京，郭成康也是如此，并且给出了重要建议，使这一课题更加可行。黄爱平总是拿出时间，见面讨论我的研究。夏宏图在档案馆陪我，她幽默风趣，学识丰富。

如果没有以下机构的许多知识丰富的图书馆管理人员、档案管理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傅斯年图书馆（台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

图书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与约翰·克鲁格中心(华盛顿特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剑桥),犹他家谱学会家庭史图书馆(犹他州盐湖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乔治·梅森大学图书馆馆际借阅部。这里无法一一开列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人,但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李静、朱淑媛;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的居蜜、Judy Liu;约翰·克鲁格中心的 Prosser Gifford, Les Vogel, Peg Christoff;哈佛—燕京图书馆的 Jessica Eykholt、马小鹤;犹他家谱学会的 Melvin Thatcher。

我得到了许多的经费支持,这对于课题的完成至关重要。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奖学金减轻了我研究生学习的外在压力。Hwei-chih Hsiu 和 Julia Hsiu 对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中国研究的捐赠使我可以伯克利学习一夏天的满语。西雅图 Blackmore 基金会资助了我一年期在台北的高级语言学习与基础研究。国际教育学会的富布赖特奖学金资助我在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进行六个月的研究。之后,我得到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慷慨资助(由美国学术委员会管理),能够于 1998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行研究。作为国际研究学者,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约翰·克鲁格中心,用一年时间认真将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成书,得到了卢斯基金会、美国学术委员会的资助。利用乔治·梅森大学的 A Mathey Junior 教师资助与学术休假,可以两个学期不必上课,进一步修改书稿。乔治·梅森大学其他的支持也极有助于本书的最后定型,历史与新媒体中心主任 Roy Rosenzweig,友好地请 Stephanie R. Hurter 提供技术服务,绘制了本书第 5 页的清晰明了的地图;历史与艺术史系向 Mr. Jake Kawatski 和 Ms. Cherry Currin 提供经费,请他们制作了本书的索引,比我自己处理要高明太多。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所请的两位匿名审读者阅读了整个书稿,纠正了史实与格式上的一些错误。此外,在过去一些年中,许多人对本书的全

部或部分给予帮助或是反馈意见。这些人包括: David Bello, Joan Bristol, 马雅贞, Lisa Claypool, Robert DeCaroli, 董玥, Mark Elliott, Joseph Esherick, Susan Fernsebner, Karl Gerth, Josh Goldstein, 韩承贤, Mike Hearn, Laura Hostetler, 胡明辉, Chris Isett, Dorothy Ko, Eugenia Lean, 李卓颖, 刘一苇, 刘璐, Susan Mann, Cecilly McCaffrey, Tobie Meyer-Fong, Steven Miles, Sue Naquin, Anne Reinhardt, William Rowe, Bruce Rusk, Randolph Scully, Mark Swislocki, Joanna Waley-Cohen, 汪利平, Erica Yao, 还有日本亚洲研究会议(东京)、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的会议参加者。虽然并不是每一条意见都吸取了,但我要对他们深致谢意,因为每一位作者都会期盼并需要活跃而认真的听众。最后要说的是,所有的错误或是不当之处都由我一人负责。

我将此书献给我的父母亲,他们给我展现了如何能带有尊严地,将日常奋斗和苦难转化为深具意义的东西。献给我的姐姐 Denise 和 Lisa,感谢她们对小弟我多多承让,不止一次地纠正我,事事为我示范。献给 Pam 和 Koni,感谢你们养育了一个出众的女儿,并教导我们如何看待问题。最后要的说是,将我的挚爱、敬重与感激献给 Sue,她的鼓励、力量与不倦的幽默,引导着我们走出可能遇到的郁闷与无聊。

张勉治(Michael G. Chang)

# 目 录

致 谢 1

绪 论 1

家产—官僚制帝国：前近代国家形成的一种模式 8

嵌入了民族意义(意识形态)的家产制 12

清民族—王朝国家的系谱 15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形成 22

第一章 巡幸的历史与多重意义 28

上古的出巡、狩猎与战争 31

战国时期巡狩的“开化” 33

作为君主—官僚间紧张关系突出表现的巡狩 36

帝制官僚与对巡幸的贬斥 39

帝制联盟与执着于季节性迁移 43

明朝的巡幸 51

结论 55

第二章 “法祖”：巡幸乃民族—王朝原则(1680年代和1740年代) 57

进谏与因应之一：康熙皇帝最初的南巡(1668—1671) 59

- 康熙皇帝恢复巡幸(1680年代):经典模式? 62  
乾隆皇帝恢复巡幸(1740年代):家族的传奇故事 68  
进谏与因应之二:汉御史的抗议(1758年12月) 80  
乾隆皇帝评论妥懋帖睦尔(1767年):历史的回响 84  
结论 86

### 第三章 将朝廷置于马上:移动朝廷的后勤与政治 88

- 皇帝的扈从与巡幸路线 88  
安排驻蹕事宜:一种旗务 92  
作为武力象征的营帐 98  
以战争规模动员各省 106  
应对大众的南巡认识 107  
结论 119

### 第四章 安不忘危与帝国政治:战争、巡幸、武备 122

- 乾隆皇帝推崇军事价值(1785年) 123  
忧惧八旗衰落(1670年代—1730年代) 127  
乾隆初年的军事危机(1730年代—1740年代) 130  
作为满洲人尚武习惯的巡幸 135  
领导层危机与八旗持续衰败(1750年代) 148  
南巡与准噶尔问题(1750年代) 151  
帝国与南巡中的耀武扬威(1762年) 157  
结论 164

### 第五章 “还淳返朴”:南巡与商业化时代精英内部竞争 168

- 培植商业财富 169  
乾隆皇帝抑制奢靡的话语 181  
士人的焦虑与皇帝话语的“为我所用” 189  
结论 197

第六章 南巡的文化包容:推崇诗歌与迎合汉学	199
召试	199
推崇诗画以笼络精英	203
苏州的文化经纪人沈德潜	207
苏州紫阳书院与迎合汉学	214
模棱两可的迎合	227
结论	231
第七章 乾隆皇帝巡幸江南的诗歌写作与政治	233
愉悦在前:皇帝的矛盾态度	234
精英文化内部的紧张:十八世纪对“抒情论”的贬斥	241
解读乾隆皇帝南巡诗作	246
初相遇:在江北厘定“江南意”	247
与金山相遇(一):引出景致与否认欲望	253
与金山相遇(二):调和并抒怀月下长江	257
日益深入:宣称勤政,拒斥愉悦	266
正统话语:马上“观民”	270
结论	278
第八章 大众认识与民族—王朝政治至上(1765—1785)	280
乾隆皇帝水利认识的再考察	281
政治至上(1770年代)	287
对民族—王朝合法性的侵蚀(1765—1778)	291
民族—王朝回应之举:恢复巡幸(1780—1785)	314
结论	323
尾 声 最后的巡幸(1800—1820)	326
民族与清统治的历史机制	331
附录 A 乾隆南巡的地方备办情况	337

附录 B 乾隆南巡全部支出的估算 345

附录 C 南巡召试的量化分析 358

征引文献 362

索引 390

译后记 425

乾隆皇帝(弘历,1711—1799;1736—1795年在位)是统治中国内地的第四位满洲皇帝,他的祖父是康熙皇帝(玄烨,1654—1722;1661—1722年在位)。乾隆皇帝既沐浴在乃祖的光环之中,又为乃祖的盛名所遮掩。1751年首次南巡时,乾隆皇帝欣然承认先辈的遗产:“粤自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巡幸东南……历今四十余年,盛典昭垂,衢谣在耳。”<sup>①</sup>康熙南巡不仅是歌颂和传说的素材,而且也是一种政治表演——众人被吸引并表现得井然有序: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癸未(1699年4月13日),御舟入境,沿途迎谒者数百里不绝,而苏州为尤盛。凡在籍诸臣为前一行,监生、生员次之,耆老又次之,编户之民又次之。水路并进,每舟列黄旛,标都贯姓名迎驾等字于其上。路亦如之。凡献康衢送若干帙,装以黄绫。姑苏驿前、虎丘山麓各建綵亭,纵广百步。榱桷栏楯极壮丽,桥巷树綵坊,锦棚高出檐表,遍列花灯。\*

这样的节庆场面被认为是“体皇上合天下之欢”。此种编排自然是有益 <sup>2</sup>

\* 本书引文中的括号内容,除特别说明外俱系作者所加;黑体字也系作者所强调。——译者

①《南巡盛典》,卷1,页27a。

于朝廷，也对苏州当地官员和名流有好处，这些人都在皇帝面前“竞献其力”。<sup>②</sup>约五十年后，乾隆皇帝通过编排具有同样寓意的万众欢庆的生动场面，以仿效“皇祖”。

1750年初，也就是在首次南巡前整整一年，乾隆皇帝发布一道关于预备“辇路”的上谕，其中坚持要能被民众很清楚地看到：“道路虽观瞻所及，间或蔽以布帷菅蒯之属，旷野中竟不为障蔽。”<sup>③</sup>在离开北京的这一天，乾隆皇帝急切地想见瞻仰圣驾的人们“阗阗通衢”，他听说“士民父老念切近光”，尤为高兴。然而，存在着一个问题，乾隆皇帝“诚恐地方有司因虑道路拥挤，或致先期阻拦”，决意不要那些操心琐碎之事的小官僚们扫此事之兴，“若道路宽广，清蹕所经，毋虞拥塞”，他在一道专门下发的上谕中，说得明白：“不得概行禁止，以阻黎庶瞻就之诚。”<sup>④</sup>六个星期后，圣驾抵达苏州，他骄傲地宣称：“入境以来，白叟黄童扶携恐后，就瞻爱戴，诚意可嘉。”<sup>⑤</sup>李斗是十八世纪末的扬州人，他证实了乾隆皇帝的叙述：“道旁或搭彩棚，或陈水嬉。共达呼嵩诚悃，所过皆然。”<sup>⑥</sup>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就瞻”的举动是相互的，充满着特殊意义。看与被看，两者“既足慰望幸之忱，而朕亦得因以见闾阎风俗之盛”。<sup>⑦</sup>

乾隆皇帝的南巡，在当时，首先乃政治上非同寻常之事。南巡的消息在整个清帝国以及亚洲沿海和大陆都有反响。日本的德川幕府（1600—1868），从停靠大阪的中国商船上的水手那里得到情报，了解到了经由江南的乾隆皇帝的长期行程。<sup>⑧</sup>朝鲜使臣在他们的日记和官方报

②《苏州府志》，卷首1，页14b—15a。

③《南巡盛典》，卷1，页3a。

④《南巡盛典》，卷1，页21a。“就瞻”乃用典，指“就目瞻云”，出自司马迁《史记》，用以描述圣君舜的美德，见倪豪士英译《史记》，第1册，页6。

⑤《南巡盛典》，卷1，页27a。

⑥李斗：《扬州画舫录》，页3，第3条。

⑦《南巡盛典》，卷1，页21a。

⑧华立：《“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

告中对南巡有记载。<sup>⑨</sup> 内亚的首领和高僧——包括六世班禅罗桑巴丹益西(1737—1780)<sup>⑩</sup>——自然会了解南巡的情况,因为有时候他们是乾隆南巡时的扈从。时至今日,南巡的景象依然能牵动大众和历史的想象。的确,每一位清史(1644—1911)乃至中国史的研究学者,多少都知道一点 1751—1784 年间的乾隆六次南巡。<sup>⑪</sup> 同样广为人知的是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sup>⑫</sup> 然而,正如著名清史专家郭成康所说:“对南巡,人人可以说两句,但是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sup>⑬</sup> 我的研究,旨在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上,填补这一空白。

让我们先对乾隆南巡“说两句”。南巡旷日持久,乾隆皇帝及相当大规模的扈从从花上三五个月的时间,巡历帝国最繁荣和最重要的地区之一——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见图 1 和表 3.1)。从出巡路线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及扈从走陆路,经直隶、山东、江苏北部,到达清河县(今天的清江)的黄河和大运河交汇处。乾隆皇帝视察那里的堤坝塘堰等综合水利设施。<sup>⑭</sup> 渡黄河后,这一移动的朝廷向南,乘船沿大运河,前往主要的县、府等治所,如宝应、高邮、扬州。就在扬州以南的地方,御舟过长江并在常州、无锡、苏州等沿线重要城市停留,之后到达浙江。在浙江,皇帝一行继续向南,过嘉兴府,接着向省城杭州进发,在那里乾隆皇帝举行召试,检阅地方军队并游览城市景点,包括著名的西湖。在后四次南巡期间(1762、1765、1780 和 1784),乾隆皇帝前往海宁县视察沿杭州湾的海塘,然后去杭州。1751 年,圣驾从杭州出发,渡过钱塘江,这样乾隆皇帝可以亲祭位于绍兴府、传说中的圣君大禹的陵墓,这是皇帝行程的最南端。

⑨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 254、576。也见 Hwang Chae(1734 年、1750 年到过北京)的评论,转引自冈斗基《国家政体和地方权力:帝制晚期中国的转型》,页 4。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页 150(文件第 197 号)、页 153—154(文件第 2—3—204 号)、页 155(文件第 206 号)、页 164—166(文件第 220—221 号)、页 171(文件第 227 号)、页 198(文件第 269 号)。

⑪ 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是在 1751、1757、1762、1765、1780、1784 年的春天。

⑫ 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是在 1684、1689、1699、1703、1705、1707 年。

⑬ 1998 年 3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内与郭成康的私人谈话。

⑭ 1288—1855 年,黄河流经山东丘陵的南部,经过苏北,在这里夺淮河入黄海。